

中国农村问题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

缪德刚 马晗嫣

摘要：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本文以近现代中国农村问题为切入点，探讨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直接关系中国革命的方向，20 世纪 20 年代，国内外围绕该问题争论激烈。然而，调查统计资料匮乏导致对中国农村问题的考察陷入困境。在此背景下，陈翰笙、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深入农村开展田野调查，实现了农村调查方法向基于本土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的根本性转变。在新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并进一步发扬和创新。本文总结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考察中国农村问题的意义及启示，强调其对当前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和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调查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调查方法 中国农村

中图分类号：B024; C0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20074/j.cnki.11-3586/f.2025.05.001

一、引言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重要法宝。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2017 年 10 月 25 日，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强调，“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①。2023 年 4 月 3 日，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要“以深化调查研究推动解决发展难题”^②。上述指示深刻阐明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为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做好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感悟这一重要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

[资助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近代国民经济核算思想的生成、转型与当代价值研究”（编号：24BJL009）。

[作者信息] 缪德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电子邮箱：ndg2016@126.com；马晗嫣，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电子邮箱：mahanyan@ucass.edu.cn。

^①习近平，2018：《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求是》第 1 期，第 8 页。

^②习近平，2023：《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14 页。

力的必然要求。事实上，调查研究是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优良传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 世纪初，为应对中国农村的经济危机，社会各界积极开展调查实践，收集大量经验数据，就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阶级关系和经济发展等问题展开激烈讨论^①。近现代以来的农村调查研究揭示了中国农村社会的诸多特征，可为目前农村发展、社会治理等问题的解决提供镜鉴，因而备受学术界关注。

现有关于中国近现代农村调查研究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将农村调查作为中国社会调查史的组成部分进行分析。例如，水延凯（2017）在《中国社会调查简史》一书中，明确界定了中国社会调查史的研究范畴，并且通过构建一个完整系统的框架，展现了中国社会调查史的发展脉络。同时，水延凯（2017）结合时间、人物及传入方式，全面考察了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传入中国的具体过程，为中西方社会调查方法的交流与融合研究开辟了新路径。关永强和祁瞳瞳（2023）对 20 世纪 30 年代在中国社会经济调查实践中采用的三种具有代表性的方法——布斯式调查、功能学派深度田野调查和马克思主义调查——所形成的主要观点、理论分歧及其认识论意蕴进行了初步剖析。其二，探讨农村调查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科学客观的方式阐释、传播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更加贴近实际，更好地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变革。邵瑞（2022）分析了以陈翰笙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村革命学术话语权的建构进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熊辉和赵辉（2019）考察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农民的悲惨生活状况、传统政治理想和传统文化特征所进行的调查研究，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历程。其三，部分研究侧重于分析农村调查本身。例如，范世涛（2020）对陈翰笙主持的无锡农村经济调查的起因、数据整理的理论准备过程及调查成果进行了分析，探索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的范式分流。孟庆延（2018）基于毛泽东的调查文本，考察其调查的实践特征，探寻毛泽东农村调查的独特路径和理论意涵。位杰和田克勤（2022）基于 1921 年至今的不同主题的农村调查，全方位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调查的实践过程与基本经验，深度揭示其历史、理论及实践逻辑。

既有研究对近现代中国农村调查的探讨尚有深化的空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梳理中国社会调查史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宏观层面，如社会调查制度的演变、重大调查活动的历史背景与影响等，较少从微观视角切入，揭示农村调查过程中被宏观叙述所遮蔽的丰富细节，以及这些微观层面的变化如何影响整体社会调查史的发展轨迹。其二，部分研究虽然涉及农村调查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但未能全面分析调查研究过程中不同调查者的理论逻辑的关系。其三，大多数研究未能捕捉调查研究方法与中国农村问题之间的互动关系，缺乏对农村调查活动兴起的充分认识，以及对马克思主义调查方法中国化的深入理解，也未能明晰马克思主义调查方法如何反过来推动中国农村问题的发现和解决。特别是未能认识到，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实践探索，农村调查方法经历了从萌芽到成熟、从单一维度向多维、从理论抽象向实证具体的转型。

实际上，社会各界通过农村社会调查逐渐揭开中国农村社会真实面貌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早期

^①详见《中国农村观察》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的附录。

调查者卜凯“开创了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实证研究”（盛邦跃，2008），采用生产成本分析法论证大农场的优势，但忽略了土地关系背后的阶级矛盾，也未能揭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如何阻碍社会生产力的进步。马克思主义者以大量的实际调查资料为基础，分析论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在中国农村经济关系中的具体表现（梁满仓，1991）。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陈翰笙独立开展了大规模的农村社会调查和研究工作。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性质和特点。特别是在土地改革的关键时期，该方法凸显鲜明的实践性与政策性。以陈翰笙和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作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不仅分析了帝国主义入侵对中国农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影响，还深入探讨了农村中的阶级关系、租佃关系、雇佣关系和商品生产关系等具体问题，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也为中国民主革命中反帝、反封建任务的开展提供了现实依据。

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方法综合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强调通过深入实际、了解情况、分析问题来指导实践。与卜凯等强调的生产成本分析方法相比，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强调阶级分析方法，在考察中国近现代农村问题过程中，注重通过分析农村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揭示农村社会矛盾的本质。从调查视野上来说，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不仅关注调查时期的农村状况，还分析历史因素对现实的影响，以此揭示农村社会结构、阶级关系、农民生活状况的历史性变化。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在调查研究发现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制度性变革解决社会问题。因此，本文从中国近现代农村问题切入，基于20世纪初国内外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争，以及国内土地革命时期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的趋势，探究调查统计资料稀缺如何导致中国农村问题考察陷入困境，厘清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在近代中国兴起的时代背景。随后，分析早期农村社会调查方法的局限性，叙述陈翰笙及其“中国农村派”在中国农村领域应用马克思主义调查方法的探索，并参考《寻乌调查》《长冈乡调查》等农村调查成果，研究土地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广泛调研与相关政策制定的关系，揭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农村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本土化的具体实践，以及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并发扬与创新的实践，为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新的视角。在整理农村统计资料的基础上，本文挖掘中国近现代农村调查研究方法背后的理念差异、方法创新及其实践意义，梳理调查研究方法与中国农村改革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历史脉络。最后，本文总结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的意义与启示，揭示其对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和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借鉴价值。

二、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在近代中国兴起的历史背景

（一）国外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

1905年的俄国革命引发社会动荡与变革，俄国处于至关重要的历史转折期。列宁认为，中俄两国革命存在共同性，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世界意义。他高度关注中国社会性质及其革命进程，通过支持中国革命来增强俄国革命的国际影响力和号召力。列宁在1912年出版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

粹主义》一文中，在深入分析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的、半封建国家……”^①，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质，为中国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20 世纪 20 年代末，苏联领导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存在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对中国社会半封建性质的认知上。例如，斯大林认为，中国社会的封建性依旧根深蒂固^②。

1926—1927 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派社会科学工作者马札亚尔（Ludwig Madyar）赴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研究中国农村和中国革命问题。马札亚尔（2015）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提出一个独特的见解：“中国发展之出发点，正是东方社会，中国高利贷资本，尚在帝国主义侵入以前，就已摧坏了解体了这生活形态，解体了东方社会，摧坏了亚洲生产方法……。帝国主义之侵入国家及国家内资本主义之发展，是加速了这个过程。自然，这个制度之残余片断，尚遗留于全国。”他认为，中国自氏族社会解体后到帝国主义侵入前，既不是奴隶社会，也不是封建社会，而是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帝国主义的侵入摧毁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础，令中国处于由该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阶段^③。国内外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不同认识，对中国革命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以上这些认识大多缺乏坚实的调查研究基础。

（二）中国开展土地革命的需要

1927 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④重要论断，使中国革命理论和斗争方式有了巨大的突破。“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然而，中国共产党当时尚未彻底摆脱以夺取城市作为武装斗争目标的苏联经验的影响，使得中国革命一度遭遇挫折。

在秋收起义失败后的文家市前委会议上，毛泽东吸取秋收起义军进攻长沙遭遇重大挫折的经验教训，提出放弃进攻大城市，转为在敌人统治力量较为薄弱的山区建立稳固的落脚点。由此，中国革命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1927 年 11 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通过了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但是，该草案客观上否定了中国的反封建革命任务，遭到苏联理论界权威米夫的否定（李自强，2022）。

^①列宁，2012：《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293 页。

^②斯大林，2001：《在联共（布）莫斯科机关积极分子会议上关于中国大革命形势的讲话》（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党的文献》第 6 期，第 66 页。

^③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马札亚尔的观点仍然受到苏联理论界和中国学者的批判。苏联学者阿甫基耶夫（1956）认为，中国只是一种东方的极端缓慢和相对停滞的原始奴隶制。国内学者侯外庐（1963）将亚细亚生产方式视为一种土地氏族国有的生产资料和家族奴隶的劳动力的独特结合，这种结合是东方古代社会构成的主要特征，并与“古典的古代”是同一个历史阶段的两种不同路径。

^④毛泽东，1993：《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47 页。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成为当时苏联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共同关心的议题。1928年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在会议上，马札亚尔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遭到猛烈批判。对于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土地问题议决案》提出，“这个根本事实，就是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现时这种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凡是上述的那些中国经济的特点，土地关系的特点，很明显的是半封建制度”^①，以作为对《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修正。

在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成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继续和深入发展”（左用章，1990）。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以两个焦点问题为核心展开：第一，在研究方法上，是以生产力还是以生产关系为主要对象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第二，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究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

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涉及中国农村的经济结构、社会关系状况及其演变趋势，社会各界尤为关注如何有效进行土地革命以推动农村变革。各方观点纷呈，反映了社会各界对农村未来发展道路的深刻思考，更在实践层面上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农村社会的转型与路径选择。这一场论战不但试图从中国农村社会视角进一步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本质，而且“在解决中国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说明民主革命的对象、动力及依靠力量方面，具有现实的革命意义”（梁满仓，1991）。革命的关键是明确革命目标或方向，这必须借助于调查研究方法。

（三）考察中国农村问题的现实困境：调查统计资料匮乏

在19世纪80年代至19世纪90年代的俄国，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思潮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主要挑战。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民粹派之间的争论聚焦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轨迹的预判上，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层面的讨论，更深刻触及俄国未来社会变革的性质、路径及领导力量等政治议题。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在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一书中，“根据对种种统计资料进行的经济学上的研究和批判性的审查，分析了俄国社会经济制度，因而也分析了俄国阶级结构”^②。民粹派重要代表恰亚诺夫（Alexander Chayanov）则亲自参与农村调查，基于对大量社会调查资料的总结建构其理论。列宁和恰亚诺夫在构建其理论体系时，都运用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不仅广泛涉猎各类文献资料，还收集详尽的数据和进行细致的实地调研（张慧鹏，2018）。列宁在《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制度》一文中强调：“尤其是对争论最多的农业经济问题，更加需要根据准确的大量资料作出回答，何况在欧洲各国和美国，对全国所有农场作定期统计，已经愈来愈习以为常了。”^③他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201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09页。

^②列宁，2013：《第二版序言》，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1页。

^③列宁，2017：《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制度》，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17页。

倡导利用丰富翔实的数据来深入剖析社会经济状况，有效整合相关资料，精确把握农户特点。列宁的观点对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科学研究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实证研究方法在苏联成立后得到了广泛采用，尤其是在研究农村问题方面。该研究方法影响了马札亚尔，他开始关注统计调查方法，并将其应用于自己的研究。

1928年，马札亚尔出版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在撰写期间，他主要依赖的数据较为有限，主要包括宏观统计资料，以及俄国学者佛林（M.Volin）氏和约克（E.Yolk）氏的研究成果。在书中，马札亚尔（2015）指出：“可是因为一提中国问题，并无可靠之事实与精确之统计……也许只用事实说明，而不加以估计，考察及结论，是最为适当……恐在中国内战状况之下材料搜集与研究，不甚完善。”上述提及资料因为研究方法上的偏差而未能充分反映中国经济的特殊性。即便马札亚尔意识到这些资料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他仍然提出“中国是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的观点，此结论的可靠性面临数据来源有限性和可靠性的双重挑战。

尽管马札亚尔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并未得到苏联理论界和中国学者的普遍认可，但其观点激发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深入挖掘本土材料的热情。在研究中国农村及社会史问题时，马札亚尔在调查材料的基础上构建新的理论框架，突破了传统历史分期观念，并就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变给出了新的解释。1928年在《新生命》月刊中谈及社会阶级的存在与否时，陶希圣（1928）根据谭平山在汉口土地委员会上公布的两个统计表得出中国土地分配不均的结论，不过他也承认当时统计数据的不可靠性。在这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虽然社会各界讨论的重点是社会性质的本质规定，但统计分析作为一种量的说明方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面对国内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路线调整，以及农村调查统计资料匮乏的现状，各界人士投身农村，进行实地调查，以期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农村社会的真实状况。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完成了大量有关农村问题的著述。仅从相关调查资料来看，相关调研工作尽管在理念、地域和内容等方面存在一些差异，但各具特色。当时收集的大量关于农村社会的第一手资料，为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在中国的具体实践提供了宝贵参考。

三、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在中国农村领域的探索和实践

（一）早期中国农村调查的局限

近代中国农村调查可追溯至葛学溥（D. H. Kulp）对广东潮州凤凰村的调查^①。在《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一书中，葛学溥（2011）以“家族主义”为核心，记录了凤凰村1918年和1919年的人口、经济、政治、教育、婚姻和家庭、宗教信仰和社会控制等情况，并运用当时最新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揭示中国乡村社会的真实面貌以及存在的一些基本问题。但该项调查存在一定的偏差与不足，如葛学溥错误地将凤凰村判定为单姓村落。事实上，凤凰村自建村伊始，便呈现多姓共存的村落格局，只是从20世纪起，其中某一姓氏的人口逐渐占据优势地位。此类认知

^①该项调查实则由葛学溥的学生完成，葛学溥仅于1923年到凤凰村进行短暂访问。

偏差反映出凤凰村调查的局限性，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葛学溥对中国文化缺乏较为深入透彻的理解；二是此次调查仅停留在表面，缺乏对村落社会结构、阶级关系等方面的深度挖掘和系统研究。

早期最为知名的中国农村调查是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卜凯主持的农村调查。在美国农业部的资助下，从1922年夏开始，卜凯引导选修“农场管理学”的学生深入家乡，要求他们调查100户以上农户的经济情况。卜凯最初的目标，“原不过欲使本系学生借得实地调查的经验，所得材料亦只希望用作例证学理之教材”（卜凯，1937）。至1930年，卜凯抽样调查的地域更加广泛，覆盖7个省份17个地区，涉及2866户农户，具体情况见表1。为确保调查结果的准确性，卜凯首先设定了调查员的选择标准，即必须熟悉当地的农业状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调查地点的选择。在地域划分上，卜凯将调查区域划分为两类：中国北部（安徽省、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和中国东南部（安徽省、浙江省、福建省、江苏省）。在完成所有调查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后，卜凯师生团队将这些宝贵的资料汇集成册，出版了《中国农家经济》一书。书中，卜凯采用的农户分类法是钱俊瑞（1934b）所提及的“将农民分成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虽然能以较简便的形式呈现某个区域内的田权分配状况，但从分析农场经营性质的角度来看，这种分类方法并不适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美国农业主要采用家庭大农场制或家族企业的经营形式。在此背景下，卜凯参考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农业发展经验，主张在不改变中国既有土地分配制度的前提下，引入资本主义的经营模式来兴办大型农场。他强调通过技术革新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生产力，并采用生产成本分析法来论证大农场的优势。这一观点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卜凯的农户分类法和对材料的分析未能揭示土地关系背后的尖锐阶级矛盾，也未能揭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如何阻碍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继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首次农家调查取得显著成果后，1929—1933年，在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资助下，卜凯又发起了一次规模更大的农村土地利用调查，具体如表1所示。此次调查的范围空前广泛，涵盖中国的22个省份、168个地区，共涉及16786块田地和38256户农户。基于这次详尽的调查，卜凯撰写了《中国土地利用》一书。在该书中，卜凯将调查区域划分为两大农业地带和八大农区，调查内容涵盖气候、土地、食物营养、家畜与土地肥力等方面。

表1 卜凯的农村调查

调查时间	调查区域		调查项目	出版专著
1922年夏— 1930年	7个省份 17个地区 2866户农户	中国北部：安徽省、河北省、 河南省、山西省	农家经济情况（包括耕地面积、土地使用情况、经营模式等）	《中国农家经济》
		中国东南部：安徽省、浙江省、福建省、江苏省		
1929—1933年	22个省份 168个地区 16786块田地 38256户农户	两大农业地带 八大农区	气候、土地、食物营养、家畜与土地肥力、物价与税则、作物种类、农场规模、农场劳动力、农产品运销、生活水平、人口分布等	《中国土地利用》

尽管卜凯进行了“历时最久，调查地域最广，调查项目最详，和比较上最富于科学性的农村调查”（钱俊瑞，1934a），但其调查方法决定了此项调查在揭示中国农村社会主要矛盾方面作用有限。实际

上，早期中国农村调查均未将揭示农村社会的剥削关系与阶级关系作为研究目标，这与马克思主义者采用的农村调查研究方法存在差异。

（二）陈翰笙主持的中国农村调查

1927 年底，马札亚尔离开上海返回莫斯科。当时，他正投身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创作工作，机缘巧合之下与陈翰笙相识。此后，二人一同任职于共产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在共事期间，两人交流频繁，但在中国农村问题上存在观点分歧。陈翰笙认为，中国农业本质上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具有鲜明的封建社会性质。然而，面对马札亚尔提出的“中国是由亚细亚生产方式决定的社会”这一观点，陈翰笙意识到，仅凭自己的主观看法和匮乏的资料，不能有力地驳倒马札亚尔的观点。为了澄清争议，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的本质，陈翰笙下定决心对中国农村进行全面的实地调查，通过实地走访和深入调研，获取第一手资料，为中国农村的性质和前途分析提供有力的证据。这一决定最终催生了之后他领导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开启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新篇章。

当时正处在中国社会调查的早期发展阶段，布斯式调查法是主导范式。这种调查方法强调通过量化统计和实证分析来洞察社会问题。然而，这种方法因其固有的局限性而饱受质疑，如沟通障碍和问卷设计缺乏对中国国情的深入考量，导致调查结果片面或失真（关永强和祁瞳瞳，2023）。以陈翰笙为代表的学者，指出了布斯式调查法的局限性，认为该方法过度聚焦于表面数据的堆砌与分析，忽略了潜藏于社会现象背后的复杂结构与阶级关系。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入与影响扩大，陈翰笙等倡导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与实践导向融入社会调查，强调要深入剖析生产关系，以揭示社会问题的本质与根源。这种转变标志着中国社会调查方法论的一次深刻变革，推动其向着更加全面、深入且贴近中国实际的方向发展。

从苏联回国后，陈翰笙聚焦于中国农村实地调查工作。在确定调查地点时，他选择了江南无锡、河北保定和岭南广东三大调查区域，认为这些地方在中国工商业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同时农村经济变革特征也较为显著，极具研究价值。他希望通过深入理解这三个不同经济区域中生产关系的演变，来窥见全国社会发展的大致脉络。陈翰笙这种调查研究思路和方法，为后续开展的调查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他的带领下，首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遵循这一思路有条不紊地推进。其中，确定调查地点、复印调查表格和招考调查员等前期准备工作就耗时 1 个月。在调查过程中，调查团详细讨论了调查表格的设计、调查技术的运用以及应对不同环境的策略等问题。1929 年 7—9 月，45 人的调查团采取逐户调查的方式调查了无锡地区 22 个村，采用概况调查方式调查了 55 个村，并对 8 个市镇的经济生活状况进行了调查和详细记录。1930 年 5—8 月，68 人的调查团调查了保定地区 6 个农村市场、78 个村庄以及 11 个村中的 1773 户农户，取得了大量真实可靠的调查资料（陈翰笙，1988）。

（三）“中国农村派”对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的践行

1933 年，为了扩大调查力量，陈翰笙等共同发起并建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随后创办了《中国农村》理论刊物。他们遵循马克思主义指导，因而被称为“中国农村派”。该派别的研究宗旨在《中国农村》发刊词中得到明确阐述：“根据我们底（的）目标来研究农村经济，最根本的问题是要澈（彻）底地明了农村生产关系和这些生产关系在殖民地化过程中的种种变化。简单的说，就是要找寻那些压

迫中国农民的主要因子……”（《中国农村》编辑部，1934b）中国农村派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核心目标：首先，全面剖析各阶层村户在农业生产中的内外关系；其次，基于这种认识，探索并推动农村生产关系改造，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中国农村派的研究方法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运用。他们通过深入研究农村社会的生产关系，探寻其背后的社会性质，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理论框架。

据薛暮桥回忆，陈翰笙在无锡和保定两地的调查之初，请自己帮忙整理调查资料。此后，薛暮桥便“步入经济研究的领域，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经济研究生涯”（薛暮桥，2006）。他积极参与陈翰笙主持的中国农村调查工作，并担任《中国农村》理论刊物主编的职务。在《怎样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基本知识（一）》一文中，薛暮桥对那些在研究农村经济问题时难以抓住核心问题的学者进行了深入批判，指出这些学者往往重点研究自然条件、生产技术、封建剥削或农产商品化程度等单一因素，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应聚焦于农村社会的复杂经济结构，即整个经济体系（薛暮桥，1934）。那么，具体应如何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呢？薛暮桥认为，这需要结合事实的分析和理论的探讨。“首先是去认识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农村社会底（的）各种生产关系，明了它底（的）一般的运动法则；接着观察中国农村中的各种生产关系，从事这种特殊结构底（的）分析和研究。”（薛暮桥，1934）其礼社镇调查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该调查涵盖人口、宗族、地主、农民、租佃、行政、党部、商团、农会、教育、田赋、税捐、家庭手工业、阶级、革命等多个宏大主题在江南村庄的实际情况。

作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主要成员的钱俊瑞，在批判卜凯的农户分类法的同时，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用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的分类方法分析“田权，雇佣关系，以及其它在生产和交换上的人与人间的关系”（钱俊瑞，1934b）。对于卜凯提出的农户分类法，钱俊瑞（1934b）指出其存在两大缺点：第一，卜凯未认识到土地关系中剥削的本质，导致其农户分类法未能全面反映农场经营性质和农村经济关系；第二，他未充分考虑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化对农户经营的影响，使该方法缺乏对社会发展趋势的把握。

中国农村派整理了当时流行的四大类阶级分析方法，具体如表2所示。

表2 中国农村派整理的当时四类阶级分析方法

方法	标准	分类	优点	缺点
1	租佃关系	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	从所耕田地的田权看农户性质	不考虑地主的影响，忽略农民和地主的具体关系；无法表现农户内部的经济地位
2	所种田亩面积	大农、中农、小农	能够把握土地耕作面积的大小以及生产方式的差异	不考虑地主的影响，得不到正确结论；抹杀农户所耕田地的田权关系（经济地位）
3	所有权关系	地主、大农、中农、小农（地主、富农、中农、贫农）	能够表示某区域内的田权分配关系（经济地位）	无法精确区分地主、农民（界限模糊）；忽略无田地的村户的性质

表 2（续）

4	各类村户经济生活的几个重要指标	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	考虑村户生活的全部，规定各类村户阶层
---	-----------------	----------------	--------------------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编辑部，1934a：《读者问答一 怎样分类观察农户经济》，《中国农村》第 1 期，第 101-106 页。

其中，第四类阶级分析方法是中国共产党所提倡的阶级分析方法，其重要指标包含田地所有权关系、所种田地的田权关系和从事农业劳动的雇佣关系三大关系。中国共产党派将村户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五大阶层。其中，拥有大量土地，根据土地所有权来剥削他人的为地主；种地较多，自己参加耕种，雇工承担大部分农业工作的为富农；既不雇人耕种，也不被雇于人，所耕田地可满足家族和经营的必要的小土地所有者或佃户为中农；耕地不足或租田耕种，并且被雇于人的农户为贫农；仅靠出卖劳动力替人耕种，或被雇于与农业相结合的事业的村户为雇农（《中国农村》编辑部，1934a）。

1933 年 8 月，陈翰笙在太平洋国际学会上发表论著《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The Present Agrarian Problems in China*），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剖析中国农村土地问题。他追溯农村调查资料的来源，点明 1926 年夏俄国学者佛林（M.Volin）氏和约克（E.Yolk）氏在广东收集的资料，近乎全部源自当时由富农和中农主持的农民协会。马札亚尔基于这份具有局限性的资料对广东土地分配状况所做的评估，难以反映广东土地分配的真实情况，其客观性与全面性存疑。

在对比不同国家的农业模式时，陈翰笙指出，尽管在其他国家，少数地主掌握大片土地，并集中雇用大量贫农进行规模化耕作的农业模式相当普遍，但这一模式在中国和印度并未出现。这主要是因为，中印虽然以小农经济为主导，地主所征租金相对菲薄，但贫困农民占比很大，土地过度分散引致时间、资金与劳动力等资源的无谓耗散，难以形成大规模的农田耕作系统。农户的土地面积小，几乎不可能聘请农业专家来指导生产。但在欧美等国，大规模和中等规模的农田企业常常聘请专家以获得最大产出。针对当时中国农业生产面临的现实困局，陈翰笙指出，只有摒弃小农经济的思维模式，专门的农业技术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应用。倘若生产技术能够持续进步，耕地面积有所缩减理论上不会成为农业产出提高的较大阻碍。但中国耕地面积的缩减往往伴随着生产方法的退化，这种资源匮乏的现实限制了生产方式的提升，农业难以扩大生产。此外，贫农群体长期陷入经济困境，其耕畜、农具和肥料被剥夺，最终不得不放弃原本赖以维生的小块土地。综上所述，陈翰笙认为，在人口稀少、土地开发程度尚浅的省份，土地集中化现象反而更显著。这种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正是现代中国土地问题的核心（陈翰笙，1933）。

随后，陈翰笙继续带领调查组到安徽、山东、河南进行调查。1933 年 11 月—1934 年 5 月，他开展了广东农村调查。Tawney（1937）在为陈翰笙的《中国的地主与农民》撰写的书评中提到，该书采用注重物质因素又兼顾社会因素的农户分类法，调查并统计了广东省 38 个县的 152 个村庄的自耕农、佃农和雇农，对一个重要省份大部分地区的农民生活状况进行了全面、深入和可靠的研究。

陈翰笙及其中国农村派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石，基于实地调研资料，探讨经济理论，批判“托派”与乡村改良主义思想，揭示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状况，进一步证明了中国农村的半殖民地半封

建的社会性质，为党的革命路线提供了有力的辩护（薛暮桥和冯和法，1983），推动了土地革命和农民解放的进程。

四、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的本土化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即有中国共产党人关注 and 讨论农村问题。1925 年，李大钊在《土地与农民》一文中，通过引用历史文献中的数据、1918 年农商部统计中国农户数据、金陵大学农家社会与经济调查数据等，并结合对农村社会的了解，分析了中国农村的土地分配不均、农民贫困化、土地制度的封建性以及农民运动的方向等问题。李大钊强调，土地制度改革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通过革命手段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是中国农民运动的核心目标（李大钊，1984）。《土地与农民》中的分析和结论不仅为当时的农民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后来的土地革命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人调查研究工作的经常化起始于 1928 年前后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将调查研究列为常规工作（洪向华，2023）。

（一）毛泽东主持的农村调查

至 20 世纪 30 年代，关于中国农村的统计资料仍极为匮乏，中国共产党无法了解农村的社会、经济和阶级状况，更谈不上为革命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为此，毛泽东深入农村，开展大量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

鉴于当时未全面了解中国富农问题以及完全不清楚农村商业状况，1930 年 5 月，毛泽东开展了大规模的寻乌调查。在《寻乌调查》中的“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一章中，毛泽东对农村人口成分、旧有田地分配、公共地主、个人地主、富农和贫农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分类与分析，具体如表 3 所示。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将个人地主分为大地主、中地主和小地主，并对寻乌的 8 个头等大地主、12 个二等大地主和 113 个中地主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调查显示，贫农占农民总数的 70%，中农占 18.255%，大地主仅占 0.045%。富农是相对富裕的自耕农或中农，但毛泽东指出，在贫农眼中，他们仍然是剥削者。

表 3 毛泽东《寻乌调查》中农村人口成分的调查统计数据

农村人口成分	人口所占百分比（%）	农村人口成分	人口所占百分比（%）
大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	0.045	中农（够食不欠债的）	18.255
中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下二百石以上的）	0.4	贫农（不够食欠债的）	70
小地主（收租二百石以下的）	3	手工工人（各种工匠，船夫，专门脚夫）	3
小地主中的破落户	1	游民（无业的）	1
小地主中的新发户	2	雇农（长工及专门做零工的）	0.3
富农（有余钱剩米放债的）	4		

资料来源：毛泽东，1993：《寻乌调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175-176 页。

继寻乌调查后，毛泽东又先后进行了东塘等处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等，了解苏区的实际情况。在1933年11月的长冈乡调查中，毛泽东调查了437家，共计1785人，如表4所示。毛泽东对长冈乡的户口进行了划分。其中，出外当红军及做工作的人员数量为320人。在乡的1465人中，中农和贫农的人数达1286人，工人、雇农和苦力为102人，地主和富农为77人。毛泽东还对地主和富农展开了进一步的细分统计，其中原有地主为2家，共计5人，富农为11家，共计72人。

表4 毛泽东《长冈乡调查》中的户口划分调查统计数据

户口划分		人数（人）	细分
出外当红军、做工作		320	
在乡（短夫及区乡工作人员在内）	中农、贫农	1286	
	工人、雇农、苦力	102	
	地主、富农	77	原有地主2家5人 富农11家72人
	共计	1465	
共计		437家，1785人	

资料来源：毛泽东，1993：《长冈乡调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78页。

在这些调查中，毛泽东虽自始至终采用阶级分析方法，但农民成分的划分标准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和修正，与中国农村派等采取的阶级分析方法有所区别。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按照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包括破落户和新发户）、富农、中农、贫农、手工工人、游民、雇农的标准对农户进行分类。而在《长冈乡调查》中，毛泽东则将农户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工人、苦力等群体。起初，地主和富农被视为敌对阶级，而贫农和雇农则被认为是革命的对象和力量所在。但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毛泽东逐渐意识到农民是一个复杂的群体，地主、富农和贫农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差异并不是那么明显和固定的。因此，在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中，对地主、富农和贫农的划分逐渐趋于灵活和依据具体的特定条件，农户阶级的划分方式日趋成熟。

一方面，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逐渐意识到农民的阶级地位和经济地位是动态的，并在地主和富农改造运动中提出关于富农问题的独特见解。1925年，毛泽东在其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结尾，深入剖析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并指出了革命的对象和领导力量。他认为：“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①虽然这篇文章主要侧重于分析整个社会阶级，但为毛泽东后续关于农民阶级和富农问题的思考奠定了基础。1927年1月4日—2月5日，毛泽东实地考察了湘潭、湘

^①毛泽东，2009：《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载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9页。

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具体情况，对真实的农民运动有了深入的了解，并认识到农民内部阶级的差异性。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①。他详细阐述了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对革命的态度，并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深入江西寻乌和兴国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后，完成《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两篇调查报告，详细记录了当地农民的生活状况、阶级关系及土地革命的状态。毛泽东特别关注富农和贫农的区别、生活状态以及思想认识，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农村阶级关系的复杂性与动态性，以及富农和贫农在革命中的不同作用。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他依据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占有以及剥削关系，将中国农村的阶级分为五类：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包括雇农），特别关注部分贫困农民可能成为雇佣劳动者的问题^②。该文曾被当时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

另一方面，毛泽东逐渐发现，农民的政治觉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因而应采取不同的策略。对寻乌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后，他发现贫农和佃农的政治觉悟较高，而富农存在与封建地主有所勾结的情况。在此基础上，1933年，毛泽东在《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中提出“以工人为领导者，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去削弱富农，消灭地主”^③的思想策略，以便在农村争取更多的人民群众和动员他们参与农民运动。1935年12月，毛泽东指出：“在土地问题上，对富农策略同对中农应该有一点区别。农村中的党应善于领导与监督富农，严防为富农所领导。要指出当斗争深入时富农必然转入地主阵线，这是中国半封建富农阶层的特点。”^④两周后，他提出：“富农已改变其仇视苏维埃革命而开始同情于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斗争，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为扩大全国抗日讨蒋之革命战线，特决定改变对于富农之政策。”^⑤

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工作，详细了解和分析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状况。他认为：“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⑥在革命实践中，特别是在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

^①毛泽东，2009：《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9页。

^②毛泽东，2009：《怎样分析农村阶级》，载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27-129页。

^③毛泽东，1993：《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69页。

^④毛泽东，1993：《关于转变对富农的策略等问题给张闻天的信》，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73页。

^⑤毛泽东，199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命令》，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74页。

^⑥毛泽东，2009：《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载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442页。

根据地的关键阶段，毛泽东高度重视农村调查研究的作用，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紧密结合。同时，他特别重视实地调研和群众参与，因此其调查研究工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恩格斯（2012）曾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引下，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方法并非僵化固定的模式，而是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中，在实践的反复检验下被优化和完善。毛泽东始终坚持“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②的坚定信念，这种严谨的态度使他能够更准确地把握社会本质，有效避免教条主义和主观臆断，提高调查研究工作的精准度和实效性。

（二）调查研究推动土地政策调整

近代中国农村地区的土地分配呈现极度不均衡的状态。调查资料显示，当时普遍存在的、具有代表性的基本状况是：仅占农村人口 10%的地主和富农群体，掌控农村 68%的土地资源；相比之下，占农村人口 90%的贫农、雇农、中农以及其他劳动者所拥有的土地只占农村全部土地的 1/3（陶直夫，1934）^③。这种土地占有上的巨大差距，反映了当时农村社会阶级的不平等，由此导致农民阶层的经济困境和对地主阶级的严重依附。

在土地革命初期，1928 年 12 月，毛泽东总结土地革命的实践经验，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以法律形式首次确认了农民通过革命手段获取土地的权利，有力地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不过，由于中国共产党经验的欠缺，《井冈山土地法》存在一些与中国农村实际情况不相适应的条款，如“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一切土地，经苏维埃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④等。1929 年 4 月，毛泽东又主持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法》中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⑤。这一改动有效保障了中农的利益，避免其利益受到侵害。

1937 年，面对抗日战争新形势，中国共产党对土地政策进行重要调整，将原本的没收地主土地政策转变为实施减租减息的革命改良政策，以兼顾农民与地主双方的利益，团结农民和多数地主一致抗日。1937 年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召开洛川会议，将减租减息纳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①恩格斯，2012：《恩格斯致韦尔纳·桑巴特（1895 年 3 月 11 日）》，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664 页。

^②毛泽东，2009：《反对本本主义》，载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109 页。

^③为揭示中国当时的土地问题，陶直夫（1934）在《中国现阶段底土地问题》一文中引用了多方面的调查资料，包括苏联学者塔哈诺夫 1926 年对广西东部八县的调查等，这些调查涉及不同地区的土地分配情况。通过综合分析这些不同时间节点节点的调查数据，陶直夫得出了以上关于当时中国农村土地占有状况的普遍结论。所以，这一结论并非基于某一年的单一调查，而是整合分析多个时段调查资料所得到的结果。

^④毛泽东，1982：《土地法》，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35-37 页。

^⑤毛泽东，1982：《土地法》，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40 页。

使其成为改善农民生活的关键举措。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宣告成立，其政权性质也由工农民主政权转变为抗日民主政权。土地制度与分配方案也经历了一系列调整，转变为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1942年夏秋以后，在中共中央指导下，各抗日根据地掀起减租减息运动的高潮。其中，在准备阶段，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同时推进调查研究工作，深入了解当地的租佃与借贷关系，据此确定适合本地的减租清债具体方案及其实施办法，并对地主的情况展开调研，依据地主剥削、压迫农民的程度，以及他们对减租减息政策的态度，明确争取、中立以及需要与之斗争的对象。1943年抗日根据地进入恢复和发展时期，1944年开始局部反攻，减租减息运动亟待更普遍、更深入的推进。此时，中国共产党深入开展整风运动，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广大干部克服主观主义与官僚主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践行群众路线工作方法，为减租减息运动的深入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赵效民，1990）。

在解放战争时期，基于土地革命以及抗战时期减租减息两大历史阶段的实践摸索与思想沉淀，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将抗战期间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重新转变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并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并在解放区全面开展土地改革工作。1947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彻底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该法在实施过程中暴露一些问题，如分配不均、侵犯中农利益等。面对以上问题，中国共产党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收集农民的意见和建议。随后，中国共产党对该法进行了修订。1950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更注重保护中农利益，确保土地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1952年底，全国大部分地区完成土地改革，土地归农民所有，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土地改革后不久，农村土地买卖和租佃现象日益增多。根据对河北省肃宁、河间、任丘、建国4个县的调查，1949—1950年，有10.7%的农户卖出384亩土地，占总耕地数的2.19%，其中半数以上因生活困难被迫出卖；根据对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3个省的调查，1953年，出租土地的农户占总农户数的12.5%，租入土地的农户占18.7%，在租佃关系中，富农、中农和其他剥削阶层约占总农户数的2/3，部分富裕农民凭借生产资料集中成为新富农；黑龙江省克山、海伦、肇源3个县5个村的调查数据显示，1952年，新富农占总农户数的3%，其耕地、耕畜、农具分别占总数的4%、10%和7%，且存在雇工经营、放高利贷和投机倒把等剥削贫苦农民的行为（薛暮桥等，1978）。因此，中国共产党迅速制定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遏制了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倾向，使其未能占据主导地位。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土地改革，旨在通过重新分配土地所有权，实现“耕者有其田”，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巩固工农联盟，为革命战争提供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中国共产党了解到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农民的实际需求和承受能力，准确把握农村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结构等实际情况，制定并及时调整政策，使政策符合形势需求、顺应民心民意，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坚持实事求是、深入群众的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在土地改革时期不仅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和政策性，深刻影响了中国农村的经济社

会发展进程，为中国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还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的深度融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化和本土化。

（三）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的发扬和创新

在新时代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进程中，调查研究方法依然受到重视。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在传承中进一步得到发扬，并在实践中得以创新。习近平曾谈道：“我牢记毛泽东同志的至理名言，坚持调研开局、调研开路，凡事眼睛向下，先当学生，不耻下问，问计于基层、问计于群众，每年至少用三分之一以上时间深入基层和部门调查研究。”^①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在河北省正定县任职期间，习近平就走村入户了解基层最真实的情况，并设计调查问卷，组织县委干部随机调查，主动听取群众意见。1983 年 12 月，基于大量扎实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主持制定《中共正定县委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几项规定》，明确要求县委常委建立联系户和联系点，确保每年有超过 1/3 的时间深入基层，要在调查研究上狠下功夫，实现新的突破。次年 3 月，他又以署名信的方式，督促正定县四大班子领导落实调研制度，在全县范围内兴起调查研究之风（本书编写组，2022）。2002 年调任浙江省委书记后，习近平更是将调查研究作为开展工作的首要任务。短短 10 余个月，他的足迹就遍布浙江全省 11 个地级市 90 个县（市、区）（费强，2004）。2003 年，习近平领导制定了《关于调查研究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的意见》，为调研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洪向华，2020）。

2003 年 1 月 26 日，在浙江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必须增强宗旨观念，坚持以民为本，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把调查研究作为加强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有效途径和做好工作的基本要求……”^②2005 年 11 月 2 日，习近平在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调研时强调：“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必须积极探索新时期调查研究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努力在提高调查研究对象的广泛性上下功夫，在提高调查研究内容的针对性上下功夫，在提高调查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上下功夫，在提高调查研究成果的有效性上下功夫，不断提高调查研究工作的质量和水平……”^③2022 年 12 月 26 日—27 日，习近平总书记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指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多到分管领域的基层一线去，多到困难多、群众意见集中、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方去，体察实情、解剖麻雀，全面掌握情况，做到心中有数”^④。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在调查研究对象上，涵盖社会各阶层群体和各区域、各领域；在调查研究方式上，既采用传统的调研手段，如实地走访、开座谈会、问卷调查等，又借助现代化调查手段，如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拓宽信息收集渠道。习近平新时代

^①习近平，2006：《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 2-3 页。

^②习近平，2006：《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 376 页。

^③习近平，2006：《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 536 页。

^④《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强调 坚持团结奋斗 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重大决策部署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2 年 12 月 28 日 01 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正是在一系列深入、持续的调查研究中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的，为新时代治国理政提供了根本遵循。

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成立百余年来，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作为考察包括中国农村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的重要工具，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调查研究中发现问题。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本身也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得到发扬和创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五、结语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社会结构急剧变动，革命浪潮汹涌澎湃，政治经济环境极其复杂。列宁将中国界定为半封建社会，揭示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特殊封建关系对经济政治发展的制约，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这一论断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与建设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然而，不论是列宁的观点还是其他人的观点，在当时都缺乏调查统计资料的支持。农村社会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石，对其性质的认识对于如何理解整个中国社会而言至关重要。近现代以来，诸多学者深入农村系统收集与分析社会经济数据，力图客观描绘农村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为理解中国社会性质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充分彰显了农村调查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借由量化分析洞察复杂社会现象本质的关键作用。

以中国近现代农村问题为视角考察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在中国的发展，不仅能从一个侧面揭示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的中国化历程，还可以为当下通过调查研究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以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等提供若干启示。

第一，重构农业经济史叙事体系，以发展的眼光推动“接地气”的研究。既有农业经济史领域的成果大多聚焦于正史农书、政典文献的文本，注重相关问题历史脉络的连续性梳理与规律性阐释。然而，这种以文献为核心的研究往往忽视历史知识的实践性。农业经济史研究亟须突破传统以文本为主导的农业经济史叙事方式，要系统梳理历史文献中的制度文本，提取其核心规则与治理逻辑，然后结合田野调查、口述史等方法验证文本记载的实践形态，将相对抽象的制度转化为可感知、可观测、可验证的实践逻辑，以此为基础构建更具现实解释力且兼具动态演化的叙事框架，使政策制定者能从中汲取历史经验，提升政策的适配性与操作性。研究者既要问题的发现者，更要成为可行方案的设计者，把学问写在广袤的中国农村大地上。

第二，强化调查研究方法在农村改革中的支撑作用，精准识别、解决重大农业农村问题。调查研究方法是推进农业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基础工作方法。当前，中国农村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土地制度创新、农业现代化转型、农民增收机制完善等关键领域要实现突破，就必须建立在扎实、可靠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20 世纪 80 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实践表明，唯有深入基层的调查研究才能够准确反映农民诉求，为农业农村制度创新提供第一手依据。新时代推进农业农村改革，更需要将调查研究作为破解难题的抓手。例如，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面，要通过实地考察、问卷调查等方式，系

统了解农民对土地承包权、经营权、收益权的现实诉求，关注土地流转中的矛盾，研究规模化经营与小农户利益的平衡机制。在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创新方面，要深入调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状况，分析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组织发展面临的瓶颈，探索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有效路径。在调研方法上，既要坚持传统调研方法，也要运用大数据分析、遥感监测等现代技术手段，提升调查研究的科学性和精准度。通过系统深入地调查研究，准确把握农业农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现实需求，才能制定既符合国情农情又具有前瞻性的改革方案，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

第三，发挥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的指导作用，推进研究方法的创新与理论体系的构建，助力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柯文的“中国中心观”（郭震旦，2023）表明，基于对中国实际情况的深度认知，经济学家能够提升方法论自觉，形成具有本土解释力的理论体系。百余年的中国农村调查研究实践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是认识中国农村实际问题、推进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的科学方法论。这一方法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要求研究者深入农村基层，通过系统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为政策制定提供实证依据，也为理论的升华奠定扎实的基础。农业农村问题的理论研究必须根植于对现实问题的把握，要避免先验判断、逻辑自洽的想象，要从实际调查中发现规律。在调查研究视角下研究中国近现代农村问题时，学术界应不断探索和实践新的调查方法和技术手段，通过科学的叙述方式将研究成果呈现出来，立足实际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参考文献

- 1.阿甫基耶夫，1956：《古代东方史》，王以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8-9页。
- 2.本书编写组，2022：《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习近平正定足迹》，北京：人民出版社；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第13页、第168页、第171-172页、第176页。
- 3.卜凯，1937：《中国农家经济》，张履莺译，上海：商务印书馆，第1页。
- 4.陈翰笙，1933：《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黄汝骧译，《中国经济》第四五期合刊，第4-6页、第15-17页。
- 5.陈翰笙，1988：《30年代的农村调查》，载任雪芳（编）《四个时代的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第46页。
- 6.范世涛，2020：《陈翰笙与国立中央研究院无锡农村经济调查》，《中国经济史研究》第5期，第165-192页。
- 7.费强，2004：《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会求真务实纪实——从“调研开局”到“调研开路”》，《瞭望新闻周刊》第15期，第12-14页。
- 8.葛学溥，2011：《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周大鸣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第1-2页、第4页。
- 9.关永强、祁瞳瞳，2023：《1930年代社会经济调查方法论争及其认识论意蕴》，《学习与探索》第11期，第166-174页。
- 10.郭震旦，2023：《作为方法的柯文——在学术前沿地带刷新中国史》，《史学月刊》第8期，第117-126页。
- 11.洪向华，2020：《干部要提高七种能力》，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0页。

- 12.洪向华, 2023: 《调查研究: 党员干部的基本功》, 北京: 人民出版社, 第21页。
- 13.侯外庐, 1963: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北京: 人民出版社, 第29页。
- 14.李大钊, 1984: 《土地与农民》, 载中共北京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编)《李大钊文集》(下), 北京: 人民出版社, 第822-836页。
- 15.李自强, 2022: 《民国时期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引入与传播研究》, 济南: 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6.梁满仓, 1991: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北京: 新华出版社, 第43页。
- 17.马札亚尔, 2015: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上), 陈代青、彭桂秋译,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第1-2页、第35页。
- 18.孟庆延, 2018: 《理念、策略与实践: 毛泽东早期农村调查的历史社会学考察》, 《社会学研究》第4期, 第1-27页。
- 19.钱俊瑞, 1934a: 《评卜凯教授所著〈中国农场经济〉》, 《中国农村》第1期, 第114页。
- 20.钱俊瑞, 1934b: 《评卜凯教授所著〈中国农场经济〉(续完)》, 《中国农村》第2期, 第98-99页、第104页。
- 21.邵瑞, 2022: 《〈中国农村〉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村学术话语权建构》, 《山东行政学院学报》第4期, 第109-115页。
- 22.盛邦跃, 2008: 《卜凯视野中的中国近代农业》,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8页。
- 23.水延凯, 2017: 《中国社会调查简史》,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2页。
- 24.陶希圣, 1928: 《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 《新生命》第10号, 第13页。
- 25.陶直夫, 1934: 《中国现阶段底土地问题》, 《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期, 第619-621页。
- 26.位杰、田克勤, 2022: 《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的历史回溯、基本经验与前瞻启示》,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1期, 第193-201页。
- 27.熊辉、赵辉, 2019: 《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毛泽东农村调查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第8-16页。
- 28.薛暮桥, 1934: 《怎样研究中国农村经济: 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基本知识(一)》, 《中国农村》第1期, 第36页。
- 29.薛暮桥, 2006: 《薛暮桥回忆录》,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第25页。
- 30.薛暮桥、冯和法, 1983: 《〈中国农村〉论文选》, 北京: 人民出版社, 第1-2页。
- 31.薛暮桥、苏星、林子力等, 1978: 《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北京: 人民出版社, 第58页。
- 32.张慧鹏, 2018: 《农民经济的分化与转型: 重返列宁—恰亚诺夫之争》, 《开放时代》第3期, 第112-128页。
- 33.赵效民, 1990: 《中国土地改革史(1921—1949)》, 北京: 人民出版社, 第269-272页。
- 34.《中国农村》编辑部, 1934a: 《读者问答一 怎样分类观察农户经济》, 《中国农村》第1期, 第101-106页。
- 35.《中国农村》编辑部, 1934b: 《发刊词》, 《中国农村》第1期, 第2页。
- 36.左用章, 1990: 《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之论战》,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第16-18页。
- 37.Tawney, R. H., 1937, "Review of Agrarian Problems in Southernmost China, by C. Hanseng", *Pacific Affairs*, 10(3): 344-346.

Marxist Survey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Rural Issues

MIAO Degang^{1,2} MA Hanyan²

(1.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 School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ummary: Investigative research is a key tool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achieve great success in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its core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investigative research. Investigative research on rural areas in modern times has revealed many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society, which can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solving current issues in rur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governance.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debates about the nature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as well as the trend during the domestic land revolution period of shifting the focus of the revolution from cities to rural areas. It explores how the scarcity of survey and statistical data led to difficulties in examining rural issues in China and clarifie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in which Marxist investigative research methods emerged in modern China. Subsequently, it analyzes the limitations of early rural social survey methods, narrates Chen Hansheng and his “Chinese Rural School” in their exploration of applying Marxist survey methods in the Chinese rural sector, and references rural survey achievements such as “The Xunwu Survey” and “The Changgang Township Survey”. This study furth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tensive investigative research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formulation of relevant policies during the land reform period. It reveals the specific practices of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represented by Mao Zedong, in applying Marxist theory to analyze rural issues of China and promote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t survey research methods, as well as the practices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led by Xi Jinping in inheriting, developing, and innovating Marxist survey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new era.

This provides several insights for energetically encouraging the practice of conducting investigations and studies, further deepening rural reform, and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First, reconstruct the narrative system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history and promote “down-to-earth” research with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Second, strengthen the supporting role of research methods in rural reform and accurately identify and solve major agricultural and rural issues. Third, leverage the guiding role of Marxist investig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advance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construction.

The innovation and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study lie in: First, from a new perspective o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rural issues in China, by exploring the conceptual differences,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behind rural survey research methods, this study seeks to trace the origins and thread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survey methods from Western to indigenous approaches, and to outline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mutual promotion and co-development between survey research methods and rural reform in China. Second, we will investigate how early Chinese Marxists conducted field research in Chinese rural areas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providing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Keywords: Survey Research;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Survey Methods; Chinese Rural Areas

JEL Classification: B24; C42

(责任编辑：光明)